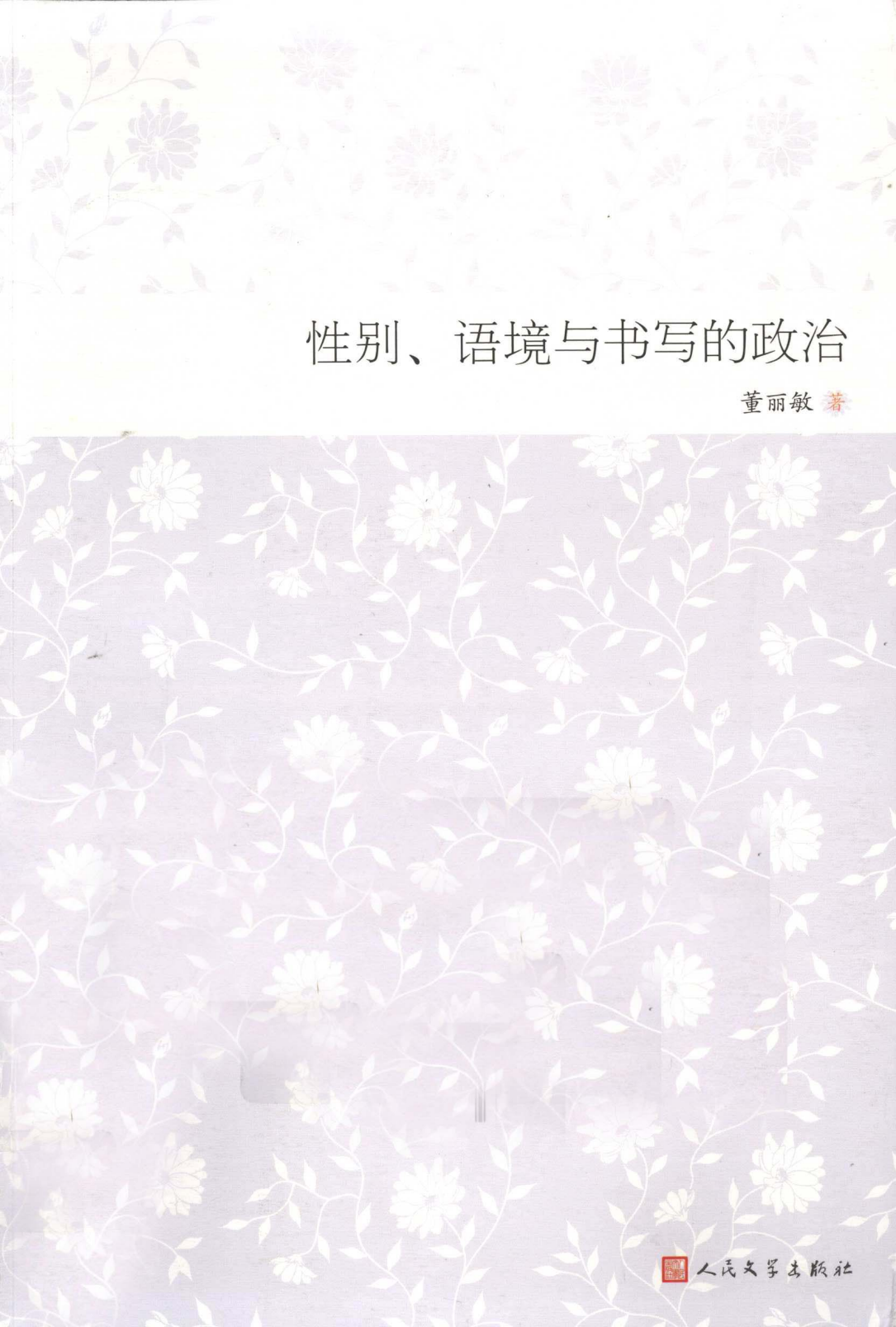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ight cream background at the top and a lavender background at the bottom, separated by a horizontal line. Both sections are decorated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white flowers and green vines. The title is centered in the cream section.

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董丽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董丽敏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董丽敏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837-9

I. ①性… II. ①董…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 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326 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2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3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37-9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

乔以钢

在中国，“文化政治”自有其传统根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培养了知识分子对政治根深蒂固的热衷与迷恋，同时也潜在地蕴育了中国政治的文化气质。时至20世纪，政治家们仍然延续着这样一种思路，即运用文化的思维、战略和运动来实践政治变革；或者说，文化即政治——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但前者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后者则在一代中国人心中埋下了深深的创痛。80年代以后，出于对“文革”的强烈逆反心理，知识群体中普遍出现了排斥“政治”、要求“文化”远离“政治”独立自为的思想情绪。毫无疑问，与这一倾向相伴随的是中国当代文化的迅速复苏和繁荣，但与此同时，在现代资本的胁迫下也催生出犬儒主义。物质至上、金钱至上，对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故作超脱、持玩世态度，在所有严肃的问题和价值选择面前保持缄默，如此这般犬儒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冷感和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消极接受。这一社会现象促人反思：当我们反感和排斥“政治”的时候，是不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我们对政治暴力的恐惧与排斥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连正常的政治应力和能动性也几近丧失。

董丽敏的著作正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诞生的，她的思考也恰是针对当前时代文化政治的困局展开。而作者的睿智、审慎之处在于选取了“性别”这一别致的角度：它融入每个人的生命本体，通常却又习焉不察。简言之，在特定的意义上，“性别”是隐藏在

人们思想与身体深处的“政治”。

这本书的主旨,在于对源自西方的“性别”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一次严肃的追问和质诘:当它被我们应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乃至学科建设时,其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究竟如何?与此同时,对迄今定位尚欠准确、发展空间尚欠开阔的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作者大胆施以精准的剖刀,就“性别”与中国语境的关联及如何关联,提出了开创性的建言。在此过程中,体现出作者坚实的理论功底、开阔的全球视野。而特别可贵的是,全书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首先,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处于后发现代性国家这一特殊语境,对包括“性别”在内的西方理论移植的有效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往往为对现代性普遍主义持有乐观期许的学者们忽视。质言之,“性别”如何作为问题被提出、被思考,其本身即已成为亟待厘清的问题。

作者的回答是,“性别”必须被赋以差异性和本土性(在地性)。这是因为,不仅不同的历史阶段性别问题的内涵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种族中,性别问题的发生、表现与指向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一问题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么,如果我们单纯以男性/女性这样二元对立的性别政治结构来进入性别问题,则在普遍化的性别问题提问方式及思考方式背后,“其实是复制了具有殖民主义意味的发达国家/后发现代性国家这样的结构”。她确认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晚清以来对女性的发现、重视、界定和动员,均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危机、战争和建设,女性的价值更多的是在与民族国家、阶级群体和男性启蒙者的协商互动和积极让渡中实现的。在作者看来,虽然刻意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强调女性之于民族国家、阶级群体的“第二性”,始终是后发现代性国家内部的男性利益集团及男性知识分子应对、压抑女性群体自觉意识与反抗实践的重要社会修辞方式,

但是,当今天的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全球化运动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受到自由主义推崇的“个人”已经无法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文化体系的束缚与压迫时,“或许只有新历史主义式的回归,才有可能在新的问题意识、新的价值维度下重设本土女性主义的理论轨道,找到女性主义更合理的归宿”。事实上,“后发现代性国家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的行为,它其实是与妇女解放运动性质接近、同步而行因而不无契合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针对当下的性别研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思路:

应该将性别问题的内外边界打通,以分析具体语境中的具体的男性/女性的关系的方式来关注和回应外部世界的大问题;或者说,以关注和回应外部世界的大问题作为一种必须的起点来推进内部的男性/女性关系的研究。由此,中国性别研究才能获得新的生长空间。

书中具体论述多方面的展开,正是这一总体思路的体现。作者没有停留于强调中国的性别文化、性别问题在历史和现实方面具有自身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其置于“空间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场域进行深入探询。支撑这一研究思路的,是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对“性别”做出整体观照的理论自觉。

其次,作者以“文化政治”为核心构建了新的思考框架,为“性别”介入文学、文学介入现实,提供了一条蕴含生机与活力的可能之路。

晚清以来,包括了两性平等、妇女解放在内的现代思想的形成,以及包括了“文学史”概念在内的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如果说上述思想与知识的应运而生寄寓着现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转变学术范畴/范式以应对学术/社会的多重危机挑战的话,那么,作为两者交集的结果,以“性别”介

入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研究范畴的提出,“其意义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内来加以分析,而更应该当作一种文化政治事件来加以理解了”。作者指出,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这类研究从另类的、看似“边缘”的视野和资源出发,发出对历史/现实秩序的质疑,并尝试在“时间”、“进步”、“发展”的脉络中为历史/文学重新编码,试图复原被主流的文化/文学秩序镇压的文学的多种面向。尽管具有一种亚文化色彩,但其问题意识、基本形态和价值指向却因为包孕着“现代”文学研究者重构文学/文化秩序的努力,而与正在形成的、其实越来越趋于主流的“现代”社会/学术形成了内在呼应性。

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作者充分实践了“文化政治”的分析方法。例如,在对20世纪50年代妓女改造运动的文学表现进行的分析中,她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与文学事件的“隐喻”性层面:在一个纠结了疾病、罪恶、欲望、道德的女性身体之上,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对其改造的意愿与方向,寄寓了充满政治意蕴的“新中国”想象。而围绕“张爱玲热”以及“性别化张爱玲”这一文化事件所进行的充分问题化与历史化的分析,使作者发现了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文化政治运作的特有逻辑,即一种因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焦虑感以及企图与此断裂的“现代化”冲动,以及在疏离甚至反叛新文化传统特别是左翼文化传统基础上发生的、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实践。针对这种迄今仍颇有现实土壤的研究思路,作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果我们是在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现实政治同时也是文化政治的本源意义上来对其加以使用,而不只是将其肢解为一种功能性的方法或者视角的话,那么性别化张爱玲的过程,也一定是如何重新激发其内在的性别政治能量的过程,而不是相反的‘去政治化’的过程。”

21世纪以来,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丛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对此,负责的知识分子一直在积极谋求对现

实的有力回应。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在商品经济及娱乐传媒的影响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本身正在急速边缘化。当此之际,应当如何厘定文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与方法,如何穿透文学空间的逼仄和科层化学术体制的坚硬外壳,到达对现实的精深理解与真诚关怀,恢复和重建“文化政治”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活力,董丽敏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富于启示性的思考。虽然她所做出的回答未必无懈可击,特别是在实践的层面上未必畅达,但其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理路以及所取得的扎实成果,对当前文学文化领域的性别研究无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目 录

“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序)/乔以钢	1
导论:性别、语境与差异政治	1
第一章 如何性别 怎样问题	29
第一节 差异性、历史语境与空间政治	
——关于中国性别研究的格局问题	30
第二节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妇女解放	
——“性别”在中国如何成为问题	50
第三节 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	
——关于中国性别研究的参照系问题	70
第二章 性别:作为文学分析的范畴	84
第一节 文化政治视野中的“妇女/女性文学”概念	
——以 20 世纪早期的“妇女/女性文学史”为	
中心	85
第二节 突围·渗透: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	106
第三节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	
——对当代女性文学史书写格局的反思	118
第三章 文学中的身体、政治与性别	139
第一节 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	
——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	140
第二节 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	
——作为文学事件的“1950 年代妓女改造”	162

第三节	“中产阶级”、“怀旧”政治与女性身份认同	189
	——论 1990 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第四章	作为美学/策略的女性叙事	207
第一节	叙事立场:个人言说 VS 底层/阶级代言	
	——女性叙事研究之一	208
第二节	“参差对照”:作为一种性别政治的叙事策略	
	——女性叙事研究之二	224
第三节	城市/酒吧/公寓:性别视野中的空间政治	
	——女性叙事研究之三	242
 附 录:		
	“性别化”张爱玲:一种文化政治的解读	
	——以《浮出历史的地表》为个案	256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性别研究	271
 参考文献		
	从“女性文学”到“性别政治”(后记)	
	——一种回顾或展望	296

导论：性别、语境与差异政治

作为 20 世纪最激动人心的社会思潮/学术问题之一，性别问题无论在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所受到的关注，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异乎寻常的。1980 年代之后，中国的学术界显然也被性别问题的魅力所激发，加入到了全球女性主义的合唱行列中；而到了 1990 年代，这样的合唱已经蔚为大观，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传媒学等诸多领域中，性别视角和理论被运用得相当普遍，成为各学科重新评估既有学术传统同时开拓新的学术研究空间的有效手段之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性别问题——主要是两性不平等问题——在其浮出历史的地表之前，曾经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蛰伏过程——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它常常被视而不见，忽略不计，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少有的盲区之一。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男/女两性所形成的基本结构基础上的，因而性别问题显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那么，性别问题为何会被熟视无睹，打入另册呢？在性别问题被忽略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社会文化现实呢？直面并且试图解决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运动/思潮是否能够实现其初衷呢？

某种意义上，重新反省性别问题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女性主义的浮现过程，可以说，包含着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史重新反省、重新书写的意味，包含着寻找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文化秩序的努力在里面。

(一)

何谓性别问题？当我们尝试审视性别文化的时候，这一问题显然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如果着重将性别问题理解为是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那么可以说，“性别”成为问题，是具有某种毋庸置疑的普遍性的。20 世纪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 就曾以“战争”作为分界线，将男性与女性划分为两大阵营。在她看来，帝国主义战争是无法以“爱国主义”作为人类确立立场的基本价值指向的，事实上，无论是处在战争的哪一方，女性都是受害者，因而在反对战争的意义上，跨国界的女性联盟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① 伍尔芙的观点显然有一定的偏激之处，但无可否认，性别问题作为一种主要横亘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问题，是具有一定的普泛意义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风俗、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男女两性之间显形与隐形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状况，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因而，在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性别歧视现象分布的时空的广泛性与普遍性，性别问题的提出，是直接针对古今中外不同社会形态中所共有的不平等的男女两性结构/性别文化的；对性别问题的讨论，是隐含着对以两性结构为基本构成的社会更和谐形态的一种召唤和探询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性别”成为问题，是有特定的条件与语境相制约的。美国学者索恩 (Thorne Barrie) 指出，作为进入“社会性别”研究的前提，“差异性”是需要首先被认识到的：

① 可参见乔继堂主编：《伍尔芙随笔全集》卷三之《三枚金币》(Three Guineas)，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4 月版。

社会性别本身,正像种族和阶级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个角色(虽然它同其他男女的具体角色相连);离开了具体的场景或组织情景,此概念是空洞的。^①

的确,“性别”为何在 20 世纪后半叶而不是在中世纪才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性别问题在英国、美国这样的第一世界国家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其内涵是否一样?解决的路径是否一致?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否相同?显然,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時候,我们能意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差异性。

应该说,性别问题的差异性首先体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在不同的时期,性别问题的实质、重心、目标是不同的。在 20 世纪中期之前,性别问题在西方世界中更多体现为男女两性在现实生活中所实际遭遇到的不平等。在受教育权、财产处分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作权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两性巨大差异,使得女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以“男女平等”为口号,将争取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各种权利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因而这一阶段也主要被称为是“女权运动”阶段。通过各种轰轰烈烈的斗争,应该说女权运动逐渐深入人心,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 世纪中期之后,在女性主要的现实权利基本达到目标后,性别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问题的重心已有所转移,它更多被理解为更深层次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领域对现有的性别秩序的支持,因而女性主义运动的侧重点就逐渐转换到对各种文化体系与知识生产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反思和批判。^②从上述对女性主义运动史的简单梳理中,不难看出,性别问题的演进历程是相当复杂的,因而其内涵也难以一言以蔽之。正

① Thorne Barrie, 1980, “Gender: How Is It Best Conceptualized”, 转引自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载《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第 386 页,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 8 月版。

②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第 4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 月版。

是因为这样,在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性别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一种直线主义的“进步论”模式去加以把握,不能简单地将今天语境中形成的性别问题思考模式套用到其他历史阶段中,更不能因此简单地加以臧否,否则就会出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去历史”的弊端而陷入“秦琼战关公”的困窘。

不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性别问题的内涵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种族中,性别问题的发生、表现与指向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一问题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陈顺馨认为:

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阵营内部也开始之以是否存在一种统一化的“女性”和本质化的“女性文化”,以及统一的“平等”追求,继而审视不同女性之间的差异,包括民族差异,以及同一民族内不同的阶级、种族、种姓、性别等方面的差异。^①

李小江在对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研究后进一步指出:

历史上,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坚始终是中产阶级妇女。……她们过分地强调妇女的群体利益,提出“用女人的团结去反对男人的世界”。遗憾的是,这一口号始终没有得到底层妇女的响应,即使在女权主义内部也从来没有过所谓“全体妇女”的统一行动。中产阶级妇女乃至女权主义理论,长久未能正视劳动妇女在社会化的同时“阶级化”这一事实,……“妇女”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虚拟的整体。^②

① 陈顺馨:《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载《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陈顺馨、戴锦华主编),第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② 李小江:《“妇女解放”质疑:历史与现实》,《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第5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的确,如果将性别问题进行一种“在地化”的研究,那么,应该可以看到,性别及性别问题由于被辐射进了“阶级”、“种族”、“种姓”等种种特定条件的差异,其研究范式不能简单落在“本质化”的层面上,而更要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女性、不同境遇的女性、不同阶层的女性因而不能被当作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有必要被区别对待,在此基础上,才能把握不同社群的女性所面对的性别问题的形态、特点和实质。佳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通过对印度性别问题的解读,指出印度的性别问题其根源不仅来自于父权制/男权制,也来源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殖民地文化的渗透与转化。^①而对后者的发现,使得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性别问题明显具有了不同于第一世界国家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对它的思考不仅要搁置在性别结构中来进行,同时也要搁置在殖民主义的框架内。而周蕾(Rey Chow)也指出,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iva)在《有关中国妇女》(about Chinese women)中对于中国古代缠足妇女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误差——由于“中国伤残女人的实践”被视为是“中国社会对于女人基本上拥有社会权力的认可,而非对于她们拥有社会权力的否认”,因此克里斯蒂娃的研究“可说是皆与‘中国’无关”,^②而不自觉地与她所要反对的父权制文化形成了合谋的关系。有鉴于此,应该说,看起来已经比较成熟的第一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研究的资源、理论和范式,也就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性别问题上;反之亦然。但这并不是说,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性别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女性主义面向就绝无沟通借鉴的必要,但如何来进行沟通、如何形成有效的彼此参考关系,

① 佳娅特丽·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载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

② 周蕾著,蔡青松译:《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第6—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8月版。

显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

正是在这样的思索下,从更深层次来说,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文化中性别问题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女性主义”这样的提法更多只是一种立场和意识,但其具体的实质需要通过在具体语境的结合来加以充实和建构。正如乔以钢所指出的:

性别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一系列差异的集合体,它不能单独决定女性的地位、经验和认同,阶级、种族、年龄等诸多因素都会介入女性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以及社会对女性的认知。严格地说,不存在统一的“女性经验”,因此需要把性别置于各种差异之中进行考察。^①

所谓普遍意义上的性别问题以及由此建构出来的普适化的“女性主义”其实更多停留在理想“乌托邦”的层面上,一旦落实到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其实根本无法拥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女性主义理论可供操作。

(二)

作为着重关注“两性差别”特别是两性不平等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和人权、自由、平等等理念大行于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应该说妇女解放运动首先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中汲取营养而逐渐脱颖而出的,但另一方面,它的呼啸而出,它的自立门户,却也可以被视为是对文艺复兴这一历史主流运动的不满与纠正,意味着性别问题已经无法被遮蔽在历史的

^① 乔以钢:《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文史哲》2007年第2期。

帷幕之后,无法被单一化的同质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话语所有效解决,因而在这一点上,妇女解放运动包含着对于像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主流历史事件的一种反省和背叛。

正是建立在这种汲取/背叛的双重层面上,16世纪以降,西方世界中的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一种曲折的行进历程。妇女解放运动时而与社会主流运动相伴而行,时而又成为社会主流运动的叛臣逆子——在法国的大革命中,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在英国的宪章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群体寻求自身解放的不屈不挠而又分外悲凉的身影。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投影,各个阶段的女性主义论述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历程。

早在1791年,法国著名的女性领袖奥伦比·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女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她宣称:“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①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所撰写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更进一步指出:一是男女之间没有根本差别,女性之所以弱于男性,完全是由环境 and 教育造成的;二是男女彼此相倚,男女地位的不相等将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三是男女应该接受同等教育。^②应该说,两位女性运动的先驱者所提出来的“男女平等”,既汲取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精神,又有效地延伸了法国大革命所未能达到的性别空间,从一个新的角度为女性群体寻求解放奠定了基础。从此之后,更多有关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式从历史的帷幕后透露出来,逐渐成为觉醒了

① 转引自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转引自吴庆宏:《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第21页,北京图书馆博士论文库藏,2002年。